

修订版



谢泳 著

XI NAN LIAN DA
YU ZHONG GUO XIAN DAI ZHI SHI FEN ZI

西南联大

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福建教育出版社

修订版



XI NAN LIAN DA
YU ZHONG GUO XIAN DAI ZHI SHI FEN ZI

西南联大

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谢泳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34-5163-9

I. 西… II. 谢… III. 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 ②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IV. G649.287.41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7515 号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谢泳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本 889mm×1265mm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163-9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7445) 联系调换。

目 录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1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24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35
一个学科消失: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为例	44
“一二·一”运动中的三个教授	55
叙永级学生的命运	68
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	78
傅斯年与西南联大	89
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98
大普集:1940年代的“中国皇家学会”	113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	121
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40
再版后记	157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①。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

^①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载《科学学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载《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第70—74页。

所言：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①

西南联大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②

①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13页。

②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550页；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613—1614页。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 21 名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引者注：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①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③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④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

①②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2—3页。

④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载《简讯》1982年第11期，第9页。

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九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

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①

^① 张申府：《一个呼吁》，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515页。

二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是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曾被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来概括，不过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所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

第一批 47 名留学生，其中 31 人留日，16 人留西洋^①，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初步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 1909 年，比京师大学堂晚出 15 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从 1904 年建立中学到 1919 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期。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 40 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 名	生 卒 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①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 23 页。

② 参阅刘克选：《30 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6 页。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 19 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 15 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 20 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 1909 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这期间有两代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即 19 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 20 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锺书、费孝通为代表）。上世纪 30 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在 50 岁左右，更有像钱锺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 30 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华的较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 1909—1929 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 年梅贻琦，1910 年胡适、赵元任，1914 年金岳霖，1915 年袁复礼，1916 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 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 年刘崇铤、叶企孙，1919 年钱端升，1920 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 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

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炆、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揖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诒，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①。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个年度外，在近20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

三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年龄下限约为1920年，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这里主要分析教授群体。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锺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锺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

^①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636—646页。

也受传统教育，但其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接受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当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使用西方的方法来治传统的中国学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锺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将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①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会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如果中国社会有较长时间的稳定，西方文化是可以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生根的。1947

① 《联大八年》（昆明，1946）。

年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以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① 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说：

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②

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作出如下评价：“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③ 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④。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

① 见《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

② 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311页。

③④ 费正清著，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第223页，第225页。

张奚若、钱端升等 12 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①。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在华的利益来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

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②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

① 费正清著，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第 226 页。

② 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第 101 页。

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① 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②

四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自由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

自由流动的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

① 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14页。

② 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第66页。

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关怀社会价值的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自主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较难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一般人以为大学教授很难合作，但这只是刻板的道德评价，由于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倾向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产生的矛盾亦较多。但自由流动的权利使他们能在矛盾激化以前便主动作出选择、回避。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徙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1949 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 300—400 元，最高可达到 500 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 120—200 元，助教为 80—140 元，一般职员 30—100 元，工人 9—25 元^①。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 20 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

^① 参阅刘克选：《30 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9 页。